

“中国：现代性与传统”论丛

启蒙 与 革命

——“五四”激进派的两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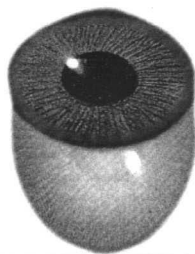
张宝明 著

学林出版社

启蒙 与 革命

——“五四”激进派的两难

张宝明 著



学林出版社

启蒙与革命

——五四激进派的两难

作 者：张宝明

特约编辑：倪为国

责任编辑：曹维劲

装帧设计：姜 明

出 版：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上海师大印刷厂

版 次：199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0

字 数：21 万

印 数：3000 册

定 价：15.00 元

ISBN 7-80616-338-7/B·33

编者前言

自从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各个国家都毫无例外地面临着现代性的挑战,尤其是那些传统深厚的文明古国,因为,所谓现代性问题,就其本质来讲,即是由传统结构向现代社会转型而引出的种种难题,它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群体的价值转换,个体身位的重新确认等等。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创造。”

近百年来的中国同样一直被现代性问题困扰。毫无疑问,它正是在这种与传统不能割断的历史延伸中艰难地向现代社会跋涉的。唯其如此,探究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性与传统中国、现代性与中国传统便成了本世纪和下一世纪国人特别是学人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

本论丛正是围绕着“中国:现代性与传统”这一主线展开各课题的研究与出版的,并特别注重原创性、当代性和批判性,以期通过这种努力,积累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提供对传

统的现代转换的建设性思路。

本论丛包括三个方面：基础理论研究，专题研究及专题论文选集。

1997 年 1 月

导 言

“五四”，一个并不新鲜的话题。但，它又是一个永不过时、常读常新的话题。问题在于今天的你我能否只“重复昨天的故事”？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这也是它能发展成为一门拥有庞大学术队伍、成果汗牛充栋之显学的重要原因。对这样一个“老生常谈”式的历史话题，我们需要的是常读常新的心灵对话，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延续。

一个艰难的选择摆在笔者面前，我常常彻夜未眠：也许注定今生和“五四”先驱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从我正式踏入学术天地的那一刻起，我就紧紧抓住了“五四”天堂的大门：悬在思想之崖，攀援、挣扎、颤抖……。

夜深人静的时候，星斗阑干。我常和心目中的历史角色

打得难解难分,心灵的对话愈来愈烈,亦愈来愈深。在他们身上,我的影子历历可见,而在我身上,也分明有他们的痕迹。这也就应验了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那句名言:“未来如同历史”!

是的,我选这么一个历史现象去做,根本着眼点并非为“过去”而“过去”,而在现在与未来,并通过再现过去而映照生活的未来图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愈来愈受关注的今天,从“五四”激进派在“启蒙”与“革命”之间的两难这一独特视角审视五四思想史的来龙去脉,必能在死亡的历史废墟上营造一方生命的绿洲。这,正是社会史“再现过去”的意义所在。

(一部“五四”思想史,也就是激进主义人物思想的演变史。而在这个演变中,(文化)启蒙与(政治)革命堪称两条贯穿始终的线索。)撇开“五四”林林丛丛、纷纷扬扬的思潮,从启蒙与革命这两条主线出发把握这一断代史,会更利于从总体上理解“五四”以后的现代中国。

在研究“五四”激进主义人物的时候,首先需要对“启蒙”一词进行释义。“启蒙”一词,有泛指与专指之分。泛指,意为语言文字上的普通用法,如《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中的义项。作为专指,它就是“启蒙思潮”和“启蒙运动”时代思想意蕴的代名词。在本质上,它和一般意义的启蒙有两个不同:首先,它是指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冲突;其次,它“主要不是一种政治运动”^①或说离政治(革命)相对疏远。严格说来,它是思想、文化畛域的内容。目标是全新人格的觉醒,完全是在文化的最深层次——心理结

^① 汉普生:《启蒙运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261页。

构上运作。西方启蒙主义的人文传统注重人的个性自由和精神解放,“五四”新文化运动立意“伦理的觉悟”这一“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具是心灵之约。本文的“启蒙”,如果在使用时不加“政治”之类的限制语,均是在该意义上运作的。

“激进派”(radical)一词第一次被使用是在英国。1797年,C.福克斯在要求实行“激进的改革”时率先运用。起先,该词的意义只用在政治上,后来外延不断扩大。现在,人们通用的激进主义泛指在任何一种领域以“矫枉过正”态度作为准则的言行。由此看来,“激进”一词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可能有一定的程式、标准或量化处理方法。它只是相对于保守、缓进、温和态度而言的行事规则。

本文拟论的激进派,意指围绕《新青年》杂志,以文化批判和思想建设起家的一群思想先驱。然而必须看到,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五四”激进主义群体都有其复杂的一面,在这样一个声势浩大、人才辈出的文化阵容中,思想的大合唱固然构成了共鸣的强音,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毛泽东、俞平伯、章士钊等一代文化和政治巨子各领风骚,但同时也必须看到,每个人的性情和经历又使其思想各有其景,不可能简单划一。因此,选择其中的某一个案去分析很可能失之偏颇,难以整体上俯瞰“五四”激进人物的全景。撇开单个人物的分析而把握一个整体,随之而来的一个难题又摆在我面前,“五四”人物纷繁复杂,群星荟萃,将人物一个一个地展开亦不可能——事实上这样做的研究体例已不少,但都很难取得应有的效果。经过反复思考与论证,我选择了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等四位人物作为本文立论的中心。当然,“五四”的每一位人物都各有其独到的一面。

换言之,将每一个人物放在一个特定的领域都是一个呼风唤雨、顶天立地的角色。

从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是中国近代的“启蒙四杰”,那么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就堪称中国现代的“启蒙四杰”。这里,我并没有用后“四杰”与前“四杰”对称的意思。从“激进”的意义上说,陈、胡、鲁、李最具典型意义;从论题“两难”的角度出发,他们更利于充分显示激进派内部的紧张;同时,他们都是《新青年》的主要作者和编辑。四位的影响最大,堪称新文化阵营之中坚之中坚。

这是一个关于“五四”激进派团体内部研究的专题。就陈独秀(1879—1942)、胡适(1891—1962)、鲁迅(1881—1936)、李大钊(1889—1927)这四位思想先驱而言,我的研究不是关于他们思想传记的集合。我的立足点还是想尽量揭示现代化的误区,为中国走上坦途提供一个注脚。著名现代化理论家希莱克认为“现代化和传统性并不是相互对立和排斥的极端状态”,“无论是哪种现代化关键都在于传统性和现代性的互访”。^①既然在现代与传统间缺乏足够的涵纳,我们就有必要小心谨慎地从事。

在这么一个简短的导言中,我不可能将我的带有个人感悟的特点说得十分透彻。如同一位著名小说家告诉读者的那样,如果你要知道我的主题,那么你就必须亲自从头到尾阅读一遍。只是这里我必须提前告诉学界朋友的是,本论对“五

^① 参见〔美〕西里尔·E·希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四”人物的文化解读,不可能像读小说一样轻松,此中真意尚须同仁们的从容读解。本文极力捕捉“五四”激进派同仁自身思想的曲折逶迤,在探幽阐微中发现他们的共识(组合)与歧义(分化)。笔者认为,“五四”激进派的“两难”一是表现在阵营内部两个走向的对立冲突,二是表现为激进主义者自我精神的紧张。理清了第一点,就可以对“五四”以后的中国现实有更深的感悟和理解;明白了第二点,也就可以从更高的层次认识“五四”人物,从而也更好地认识自己。在前者,同仁间的紧张主要表现为“改良”与“革命”的冲突,这是第一章《文化与政治的歧途》和第四章《提高与普及的走向》所着意描绘的内容;在后者,自我的困惑是“个人”与“社会”的矛盾,这是第二章《多元与一元的转换》和第三章《个体与群体的紧张》所论述的重点。当然,这样的划分也只是相对的。事实上,这四章的内容又是互为补充,相互说明着的,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在透视角度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永恒,发生在持续的追求中!

历史并不仅仅意味着古老、悠远。带着沧桑,带着风雨,在某种意义上,她最具有现代意识。正是历史的传统性和现代性的紧张构成了我们思索的基础。“五四”的命题是 20 世纪的焦点,但它也更是新世纪的起点。放眼 21 世纪,“五四”激进派的心路历程岂能视而不见?回眸“五四”,她又如何能阻止我们的心跳?

传统文化能否革命?如果不能,为什么“五四”人物一跃而起仍堪称具有现代性?

(“五四”的文化与政治抉择呈现出一种交错关系,在“五四”激进主义自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文化?政治?难解难

分的两难与紧张在这里化解。

“改良”与“革命”是中国近、现、当代思想史中一个十分严肃的热门话题。20 世纪中国的思想遗产为我们提供了丰实的精神食粮。世纪末的日子里，“告别革命”乎？“改良”放之四海乎？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从一极走向另一极，而需要深层次的理论思索。

.....

20 世纪即将逝去，新的世纪正向我们走来。

立身于两个世纪相交的历史坐标上，我们理应找到自己的位置。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文化与政治的歧路	(1)
一、共识:由立人而立国	(5)
1.1 “立人”的逻辑构成	(5)
1.2 近代以降的历史传承	(10)
1.3 时代的选择与超越	(16)
二、歧义:两股思想潜流	(23)
2.1 “不谈政治”的悖论	(23)
2.2 文学的“改良”与“革命”	(27)
2.3 “人”之两种导向	(32)
三、分化:渐进与革命	(38)
3.1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背景	(38)
3.2 救亡:“迂远”与“直接”	(41)

3.3 不可忽视的遗题	(60)
第二章 多元与一元的抉择	(66)
一、西学东渐的震撼	(68)
1.1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双重视角	(68)
1.2 中西比照:文化与政治的错位	(74)
1.3 传统与现代的张力	(79)
二、文化维度与多元思维模式	(86)
2.1 历时性与共时性	(86)
2.2 “孔学”与“孔教”	(90)
2.3 激进与保守赘言	(104)
三、从“并立竞进”到“新的综合”	(113)
3.1 对“五四”新思路的实证	(114)
3.2 “南陈北李”的文化意蕴	(118)
3.3 革命意识的历史生成	(136)
第三章 个体与群体的紧张	(140)
一、“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141)
1.1 与西方“文艺复兴”之比较	(141)
1.2 与西方“启蒙运动”之比较	(151)
1.3 科玄解读:理性偏至的必然	(161)
二、理性天平的倾斜(上):胡适与鲁迅	(177)
2.1 胡适:理性的早熟	(179)
2.2 鲁迅:灵魂拷打的现代意义	(186)
2.3 同途殊归的历史比较	(191)
三、理性天平的倾斜(下):陈独秀与李大钊	(196)
3.1 文化设计的自我调适	(197)
3.2 难耐的平衡	(203)

3.3 启蒙与政治的两难	(210)
第四章 提高与普及的走向	(220)
一、在“不党”与“有党”之间	(221)
1.1 新潮:启蒙思想的执着	(222)
1.2 奔流:革命意识的深化	(234)
1.3 走向:世纪末的话题	(242)
二、化大众与大众化	(247)
2.1 “自由”与“解放”之争	(248)
2.2 化解紧张的思维范式	(253)
2.3 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	(258)
三、在“价值”与“历史”之间	(264)
3.1 “提高”与“普及”之争	(264)
3.2 象牙之塔及十字街头	(270)
3.3 分化之再分化	(277)
结语	(285)
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	(297)

第一章

文化与政治的歧路

【提要】

《新青年》阵营自从安营扎寨的那一天起就有着文化与政治的两种不同取向，这也是后来学术界一直未能“自圆其说”的原因。但用改良的手段，还是用革命的手段走向现代却异曲同工。

【关键词】文化、政治、歧路、目的、手段。

在“五四运动”产生三周之后，其参与者罗家伦在《每周评论》上第一次将其概括成直到现在仍为人袭用的名称。此后，自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引起的一系列历史反应都被人们冠之以“五四”的头衔。然而，细说起来，“五四”的

含义并非一两句话所能概括,这里首先必须正视的一个严肃学术观点是: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次,还必须看到“五四”作为一种蔚为壮观的精神事件,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伴随着复杂与多相。后人可以从不同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遗憾的是,对五四的简单化的处理,永远是一幅幅“残缺不全”的现代性解释。为此,还原、完善五四原貌,为五四精神招魂的重负几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悠悠岁月,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个几乎已成“定论”的话题又被学术界在世纪末的岁月中炒得沸沸扬扬。这本身也反应了思想解放后的人们对一贯“真理”的怀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循环,也是一个值得欣喜的历史进步。

一则亦喜,一则亦忧。如果学术界对“五四”的观点永不过时,永远新鲜,那么我们又付出长时间的“延伸”代价。审视学术界同仁对“五四”问题的处理,不外乎两种看法,而且这两种看法有着明显的两极倾向。按照“统一”者的逻辑:“五四运动”是反帝爱国的救亡运动,又是启蒙开新的文化运动,启蒙与救亡,互相促进和结合^①。学者们很容易将“五四”激进人士一锅煮,混淆同仁内部的思路差异^②;依从截然二分方法:“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本不是一回事^③。”往往又会导致

① 丁守和:《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五四运动7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陈独秀文章选编》第3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② 王晓明:《一份杂志和一个“社团”》,《上海文学》1993年第11期。

③ 耿云志:《中西结合,创造新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再认识》,《五四运动与中国化建设——五四运动7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陈独秀文章选编》第91页。

割断“激进派”人士前后思想发展的必然联系,甚至会演出“启蒙与救亡”相互轧轹的二律背反^①。问题的复杂性在于,1919年为基本界线的“五四”两个阶段在根本主题上并没有改变——国家的富强与独立(救亡),但在思想手段上却大相径庭:启蒙与革命。学界同仁对“五四”前后两段关系的处理常犯一个偏颇:要么只顾主题,要么只顾主体,少有将主题的统一与主体的转换两者兼顾的全面论证。与此同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五四”激进派同仁虽在台上共咏一个调子,但由于他们个性、心理素质、成长经历不同,因此又不可妄作简单的划一。看看同是当事人的胡适与毛泽东后来对“五四”的评价就可见其心衷曲。胡适说:

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②

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③而且更为重

① 欧阳哲生:《“五四”运动的历史反省》,《中州学刊》1994年第3期。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两人同样倾向于将1919年前后的运动作性质、内容、目标不同的界分。不难发现,前者的“启蒙与救亡”框架深受后者的影响,但是他们同样要面临一个两难:启蒙是“迂远”的救亡,即由立人而立国,它同后来的“革命”一样,同是救国手段和工具,何以手段将目标切断?

② 《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183页。

③ 《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545页。